

战略考量与经贸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的 对华政策(1978~1982)*

陈 骏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与中国的接触迅速扩大，两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协商不断增多。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美国是制约中德双边关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但中德双方集中发展经贸交流，并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这使得双边关系得以克服这些外在的束缚，从而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以及联邦德国的联邦制度给中德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桥梁。同时，当时联邦德国驻华主要外交官员对有关问题的冷静思考也促进了德方对中国的理解。其中，经济因素对中德关系的影响显得越发重要。

关键词：联邦德国； 中国； 改革开放； 苏联； 美国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9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9)04-0021-19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华经济外交研究”(编号:17CSS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78年底,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随后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从这一年到1982年,即联邦德国(西德)施密特政府执政的4年多,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逐步扩大、发展,以及联邦德国逐渐嵌入到改革开放大潮的重要时期。中德双方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交流迅速扩大,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零的突破。联邦德国很快成为了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在投资、技术转让等领域成为了欧洲各国在华的领先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德经贸关系开始引领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双边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①得益于这一时期的交流和观察,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的《伟人与大国》一书中,将中国视作与美国和前苏联并列的三大世界强国。他认为,中国在地缘战略、幅员辽阔,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中央集权手段上都远远超过美苏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②,中国的最高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地不受干扰地发展经济”^③。

这一时期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④而国内的研究论著则比较稀少。^⑤本文在充分利用德国这几年新编辑出版的《德国外交文件》^⑥和内阁会议文件的基础上,同时查阅中方的相关档案、文献和出版物,以期对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对华政策的思考、举措、矛盾分歧、影响等有一个全面的观察和分析。根据这段时期中德关系的主要问题,本文将从直接影响中德双边

①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2014-10-11,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0/11/content_2762677.htm, 访问日期:2019-08-20。

② 此书原版是1987年写作完成并出版的。如作者所说,书中记录的有关谈话和分析内容,主要来自于自己执政时记下的笔记。这里使用的是2008年的最新中文版,参见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361-362页。

③ 施密特:《伟人与大国》,第318页。

④ 主要参见Martin Albers, “Business with Beijing, Détente with Moscow, West Germany’s China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 1969-1982”, *Cold War History*, No. 2, 2014, pp. 237-257; Martin Albers, *Britain, France, West German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9-198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Kristina Spohr, *Global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ristian Kleinschmidt/Dieter Ziegler (Hrsg.), *Dekolonisierungsgewinner: Deutsche Außenpolitik und Außenwirts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s Kalten Krieges*, München: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8 中有关这段时期中德关系的章节; Tim Trampedach, *Bonn und Peking: Die wechselseitige Einbindung in außenpolitische Strategien, 1949-1990*, Hamburg: Institute für Asienkunde, 1997; Margot Schüller, *Strukturwandel in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Analysen und Praxisberichte*, Hamburg: Institute für Asienkunde, 2003。此外,还有德国学者编撰的档案集中的有关章节: Mechthild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⑤ 代表性学术论著主要包括潘琪昌研究员主编的《百年中德关系》一书中的有关部分。参见潘琪昌编:《百年中德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⑥ 有关该档案文件集及其编撰的介绍,参见陈晔:《冷战史研究的德国档案文献资源导论》,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66-168页。

关系的苏联和美国因素，以及双方在全球问题及经贸等重大问题上的对话及合作等四个主题来进行写作。

一、中苏分歧与中德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高度紧张，双方成为彼此在全球最主要的敌人和竞争对手。^① 如何处理与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当时所有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国家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之一。尤其对联邦德国政府来说，德苏关系是新东方政策体系的核心，不能因为发展对华关系而恶化。本部分将主要对直接涉及中德苏三边关系的问题进行探讨，而文章第三部分也会涉及中德在全球问题对话中的苏联因素。

联邦德国政府首先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感到担忧。这一问题涉及德方对中国意识形态发展问题的判断。东西方或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能否避免，是联邦德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即“不以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双边争端和欧洲安全问题”。^② 但中方此时有关战争和使用武力的言论让德方感到不安。中方在1978年前与德方高层的对话中，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例如，1977年9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örner）表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如果应对策略得当，也许可以使战争推迟5年、10年或更长时间。^③ 华国锋也在同年10月对来访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指出，“大国对抗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④

与中国敌对的苏联方面也努力影响联邦德国对华的看法。1979年1月4日，苏联驻德大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Vladimir Semjonow）对德外交部国务部长克劳斯·冯·多纳尼（Klaus von Dohnanyi）指出：“没人能够提供中国人向往和平的证据，他们对苏联有着领土诉求。中国对战争的看法很轻率，这对文明世界的存在是

^① 近年来国际上有关20世纪70~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Danhui Li/Yafeng Xia, *Mao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9-1973: A new histor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8;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Sino-Soviet Split in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Alsu Tagirova, “Soviet Public Diplomacy in China: Small Steps towards bilateral rapprochement, (1978-1985)”, *Cold War History*, No. 4, 2017, pp. 405-423; Vladislav Zubok,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the 1980s: reconciliation and divorce”, *Cold War History*, No. 2, 2017, pp. 121-141.

^② 这一条款直接写入了新东方政策与苏东阵营国家所达成的《莫斯科条约》《华沙条约》《四大国协定》《两德基础条约》和《布拉格条约》中，参见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3页、218页、220-221页、234页、238页。

^③ „Dok. 256: Botschafter Wickert, Peki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5. 09. 1977,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APD), 1977, S. 1243.

^④ „Dok. 285: Gespräch des Bundesministers Genscher mit dem Vorsitzenden des ZK der KPCh, Hua Kuo-feng, in Peking“, 14. 10. 1977, AAPD, 1977, S. 1384.